

容庚先生的學術成就和治學方法

——爲紀念容庚先生誕生九十周年而作

張 振 林

容庚先生是我國著名的古文字學家、考古學家和書法篆刻家。他離開我們已經一年了。但是，他那八百萬字的學術著作、矜慎不苟的治學態度、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和治學方法，卻留在人間，與世長存，永遠值得後輩學習和借鑒。

一

容庚先生原名容肇庚，字希白，號頌齋，一八九四年九月四日（夏曆八月初五日）出生於廣東省東莞縣。他是長子，父親去世時，他才十五歲。此後，他便在四舅鄧爾雅的指導下，研讀《說文解字》和學習書法、篆刻，有時跟從叔父容祖椿學畫，間或與二舅和表兄一起品評外祖父蒐藏的書畫。於是，研治古文字，品評古書畫，成了他的癖好，成了此後六十年治學生涯的兩大內容。一九一七年東莞中學畢業後，先生不復升學，潛心鑽研金石文字。他日夕摹寫銅器銘文，剪取每一個單字，按《說文解字》體例排列起來，每字注明來源，形體與篆文相差較大或《說文》所沒有的字，則選名家考釋中可信之說簡要抄錄，暫時不識之字，附錄於後，這樣幾易寒暑，終於編纂成一部銅器銘文字典，取名《金文編》。這是先生通過自己努力所得的第一個成果。它給了先生極大的鼓舞，使先生對未來的事業充滿信心。一九二二年先生上京求學，經過天津時，攜《金文編》稿本謁見古文字學家羅振玉。羅非常贊賞，去信給北京大學的馬衡教授，稱讚先生“治古金文，可造就也”。馬衡教授接信後，即派人尋找，把剛考進朝陽大學的容庚先生，破格錄爲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的研究生。先生經過三年的攻讀，其間不斷修改充實《金文編》，至一九二五年研究生畢業時，先生的第一部成名之作《金文編》也同時出版問世了。

《金文編》不僅每一個字均摹自銅器原拓，確鑿可靠，其編排的科學性，也遠勝前代和當時學者的《說文古籀補》、《說文古籀補補》、《說文古籀三補》之類的著作，因爲它打破了以商周秦漢古文字補《說文》的本末倒置框框，凡金文結構和本義與《說文》相左者，均按文字發展觀點做出新的說明，同一單字的異體重文按時代先後排列，

同一字的不同構造分列，不同義項提行，假借、孳乳關係也盡可能注明。因此《金文編》一出版，就受到學術界極大重視。當時最著名的古文字家及金石考古學者如王國維、羅振玉、馬衡等都盛讚這一新成就，爲其撰寫序言。《金文編》既可以作爲專門家研究時的工具書和參考書，也可以作爲初學者學習金文的文字學教科書。

一九二五年研究生畢業後，先生留在北京大學當講師，一年後轉進燕京大學任襄教授、教授，一九四二年任北京大學教授直至一九四五年。在這二十年間，也就是先生三十一歲至四十一歲期間，他一方面給學生講授《甲骨學》、《金石學》、《文字學》、《考古文字學》、《簡體字》等課程，一面從事科學研究，編撰專著、圖錄、講義、論文。一九二六年冬起兼任古物陳列所古物鑒定委員會委員，以後又兼任《燕京學報》的編輯和主編。爲了阻止古物外流和推進我國的文物考古工作，一九三四年先生又團結一些同道，倡導成立了我國第一個考古組織“考古學社”，同時主持出版《考古社刊》工作。據不完全統計，這二十年間先生編撰出版的專著、圖錄、講義有二十一種，發表了論文三十篇。^①先生所編的圖錄，徹底剔除僞器，銅器器形按照片製版存真，第一次將花紋拓片獨立出來，這幾點都是先前的所有圖錄不可比擬的。三十年代初期，日本有位學者譏笑我國的古銅器研究只是“依自來之傳說，比圖錄，信款識，依習慣而定其時代”。^②先生一方面依據事實，指斥其“將多數之周器屬於漢，”不知道者汙鐘之“戊”爲越，“竊疑彼於吾國人著作尚未多窺，其識乃在‘比圖錄，信款識’之下”。另一方面廢寢忘餐地發憤著述，從一九三四年起，經過八年艱苦的鑽研和寫作，於一九四一年完成了第一部全面、系統地論述商周青銅器的專著《商周彝器通考》。該《通考》對我國青銅器的起源、發現、分類、斷代、銘文、花紋、鑄造、價值、去銹、拓墨、仿造、作僞、銷毀、收藏、著述等作了全面論述，綜合吸收了古人和時賢的研究成果，其中關於鑄造、形制、花紋、分類、斷代的研究，已突破了舊金石學的框框，具備了現代考古標型學研究的水平。由於先生的著作衆多，所用材料廣博而可靠，圖版拓片清晰上乘，分類科學，考證精審，使先生成了名噪海內外的古文字和青銅器研究專家。

從一九四六年起，先生先後任廣西大學、嶺南大學和中山大學中文系的教授，直至一九八三年三月六日去世。這段期間，先生曾擔負過《甲骨學概況》、《文字學》、《中國文學史》（先秦部分）、《說文解字研究》等課程的教學工作，招收過五批古文字學研究生。在科學研究方面，出版過三種專著，撰寫發表了二十篇論文，尚有一百多萬字關於書畫方面的著述沒有發表。其中已發表的比較重要的有《記竹譜十四種》、《倪瓚畫之著錄及其僞作》、《飛白考》、《論列朝詩集與明詩綜》、《淳化秘閣法帖考》、《殷周青銅器通論》、《清代吉金書籍述評》、《宋代吉金書籍述評》、《鳥書考》、及一百多萬字的專著《叢帖目》。

六十年來，先生在各大學任教，爲我國培養了許多古文字學和考古學方面的人才，有些早已成爲海內外知名的學者和有關單位的業務骨幹。

六十年來，先生通過宣傳、著述、結社、購藏，阻止古物外流，推進古文物的研究；新中國成立以後，又將自己所購藏的古代文物、書畫、圖籍，分批轉讓給有關單

位。先生不僅義正詞嚴地批駁了“中國人不懂得保護文物和研究古代文物”的謬言，而且以滿腔愛國熱忱和出色的研究成果，伸張了民族正氣。

先生首先把銅器花紋的研究提高到同器形、銘文研究並列的地位，開創了器形、花紋、銘文綜合研究的先例。先生給商周青銅器所做的科學分類，至今仍被田野考古工作者和文物工作者所採用。先生編纂的《寶蘊樓彝器圖錄》和《武英殿彝器圖錄》，首先採用經過精心鑒別挑選的青銅器照片、獨立的花紋拓本，同銘拓、說明、考證一起製版的做法，成了解放前二十年間銅器圖錄編纂的榜樣。先生編寫的《金文編》成了文字學、考古學和其他文物工作者必備的工具書。先生編著的《商周彝器通考》，是研究我國青銅器的一部最爲全面系統的資料參考書。先生編纂的《歷代書畫著錄目》和對各種叢帖的考證，所涉及的內容之廣、鑒別考證之精，也是罕有的。……先生在我國古代文化的研究方面，特別是在古文字學和青銅器的研究方面，做出了非常重大的成就。

二

每一位偉大學者在事業上的成功，同他的天賦、所處的家庭條件和社會環境、所受的教育有很大關係，也同他的治學方法分不開。在天賦和客觀條件相同或相近的同齡同伴中，治學方法不同，成就可以大不相同。對天賦和客觀條件很不相同的人來說，如果能選用適合於自己的前人之有效的治學方法，也可能在事業上有所造就。因此探討一下有重大成就的學者的治學方法，可爲後人提供借鑒。

治學方法通常包括兩方面的內容：一是求學的讀書方法，一是研究著述的方法。

學習和研究古文字的頭一個任務就是必須識字。漢代至今二千年來通用的隸書、楷書、行書，我們今天在生活中並不陌生。可是，秦、漢之際使用的篆書（小篆）、商、周、列國時使用的金文（古籀、大篆），和商代、早周的甲骨文，點畫結構古樸多變，已是二千多年不作通行交際工具的老古董，非專門學習不可。先生初學古文字的方法和途徑是怎樣的呢？先生常對學生們說：“我的方法是‘土法上馬’：從抄《說文解字》開始，然後抄讀《說文古籀補》、《繆篆分韻》等書。你們也可以先抄《說文》，抄完九千三百五十一個字後，再抄《金文編》、《甲骨文編》。”先生謔稱爲“土法”的抄讀法，是我國傳統的啟蒙識字法中的一種。那怕是大學畢業生，若要認識古字，掌握古文字的結構，“抄讀法”也不失爲一個有效的方法。《說文解字》是東漢許慎編纂的以小篆爲分析對象的我國第一部字典。它是學習古文字的初階，也是通向釋讀金文和甲骨文的橋樑。按先生的“土法”從經過規範的小篆入手，有《說文》的字形分析幫助，由近及遠，由易至難，在抄讀過程中，眼、手、口、腦同時並用，對小篆、金文、甲骨文的偏旁結構、主要異體，都會留下深刻的印象。有此抄讀的功夫墊底，然後再看古文字的原始材料及有關考釋時，就方便快捷得多，也不易被某些旁徵博引和音韻通轉掩蓋下的臆說胡猜牽着鼻子走。除了初學時使用抄讀法外，碰到自己沒有而又不易借到的重要著作，先生也常常要親自抄錄一過，得到新的銅器、甲骨銘拓，總要先摹寫或臨寫一

通的。

先生喜歡問自己的學生：“你準備選擇甚麼題目來做呢？”這是指確定專業方向和選題。沒有方向，沒有範圍，東看一本，西翻一頁，碰到甚麼書就讀甚麼，最後將一事無成。先生說：“有了題目，就將有關的書籍、論文找來，一本本地讀，每讀完一本就寫一篇書評，到後來就會發現先前讀書理解不深，先寫的書評有許多需要修改補充。讀完了有關的書籍文章，就等於掌握了各種肉菜和油鹽佐料，下一步則要看各人的本事了。名廚師可以憑借這些材料做出各式各樣色、香、味俱全的好菜來。差一些的人，只要不懶，也可以或炒或煮做些家常菜，不至於毫無收穫，若注意鑽研，熟而生巧，也可成為廚師。這就是研究著述的功夫，各人奧妙不同。”先生在這裏所說的是採用一書一評法，在選定攻讀的範圍內，詳細佔有資料，以及這一治學方法的目的意義。

先生說：“目錄索引類的工具書，是學習、研究必不可少的。在東莞自學時，所見金石書籍不多，有許多銅器著錄都不知道，後來見到王國維的《宋代金文著錄表》¹和《國朝金文著錄表》，大開眼界，原來還有許多書自己尚未閱讀呢。這《著錄表》成了讀書的嚮導，我得益於此書不淺。”

先生一九二二年同其三弟元胎（肇祖）先生一起赴京求學，兄弟相約，遍觀金石文字書籍，一書一評，擬編成一部金石書錄。通常一書一評，寫的屬於簡單的書目提要，包括記錄書名、作者、版本、主要內容、序跋、間或加些簡單的評語，借此鞭策讀各書一過，以求對主要內容有所理解；對於同專業選題有較重大關係的書籍，則較詳細地記錄其內容，對該書的得失、優劣做出自己持之有據的評價。一九二六年夏天，先生選擇了一些當時少見或新出版而人們未曾注意的金石書籍，在《社會日報》之“生春紅”副刊介紹。後因教務日繁，先生才將編撰金石書目提要的工作，交給其妹妹容媛。這就是《金石書錄目》出版的由來。先生於一九三二年八月所寫的《宋代吉金書籍述評》和一九六二年首次發表的《清代吉金書籍述評》^④，便是先生一書一評的實踐記錄。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先生為了佔有資料作為著述研究的準備，下了多少艱苦細緻的功夫。

一書一評法，從積極意義上說，是一邊讀書一邊編寫目錄、書評，於學習的同時即在做於他人有所貢獻的事，如牛之邊吃草邊擠奶；從消極意義上說，可以督促人們認真讀書，開動腦筋，在抄摘書名、編著者、序跋和內容目錄過程中加深記憶，若不開動腦筋，則無法中肯地摘錄前人序跋，提出自己或褒或抑的評論。

先生讀書的另一個常用的重要方法，就是校讀法。歷代學者主要是在閱讀重要的經典，或是為了校訂、注疏某一重要著作以便出版時，才使用此法。注疏家、考據家，是以此為看家本領的。先生則是在閱讀重要的銅器圖錄、金文著作，以及作為科研課題的書畫著作時，才採用此法的。譬如，《三代吉金文存》是收集銅器銘拓最豐富的印刷精良的資料書。先生手頭使用的那部書，每一塊銘文都經過同別的書籍校對，凡偽器銘、疑偽器銘、定錯器名者、重複者，均一一注出，不如別書清晰者，亦予注明，表明先生對此共有二十巨冊、四千八百三十一件銅器的六千片左右的拓本，做過詳細的校讀。又如郭沫若關於古文字的論著，自成科學體系，創獲很多，在三十年代，對我國古文字學

和歷史學、考古學的研究，起着開拓新局面的影響。這些著作的寫成，其中也包含着先生大力的支持和幫助。當先生得到郭沫若的《中國古代社會研究》、《甲骨文字研究》、《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》、《兩周金文辭大系》、《金文叢考》、《卜辭通纂》、《古代銘刻滙考》及《續編》、《殷契粹編》等著作後，都要逐字逐句逐圖地認真校讀，錯別字一一予以糾正，脫漏字都給補上，引文和注釋全都仔細地與原材料查核過，需要商討的意見則寫成眉批或旁注。解放以後郭沫若修改再版這些著作時，就得到了先生很大的幫助。當我們閱讀先生的《宋代吉金書籍述評》、《清代吉金書籍述評》、《倪瓚畫的著錄及其偽作》、《論列朝詩集與明詩綜》、《叢帖目》和各種書畫法帖考證文章時，都能發現，先生為弄清某一個文字、某一件器銘、某一幅字畫、某一首詩詞，往往搜盡有關著錄，看遍不同版本，做過細緻入微的校核。有的銅器銘文，重複見於宋代、清代的各種著錄，各著錄的刻本有大有小，字畫或肥或瘦，所據拓本有真有假，需要作縱向校核。另外，同一種著錄若有多種版本各具優劣者，還需作橫向校核。如果原器物尚存於世，也要盡可能查對驗證。只有這樣才能進一步去粗取精、去偽存真，整理出條貫，加以評述。這種校讀法，誠然是十分繁瑣、工作量非常浩大而又要求聚精會神才做得了的讀書方法。然而，就是這樣繁重而令人枯燥乏味的校讀法，使先生掌握了極其豐富的資料，包括古的、今的、粗的、精的、偽的、真的，包括出土的原始材料、文獻記載、筆記、地志、論文、專著、圖錄、照片、實物等各種各樣的資料，使他能任在教務、編輯工作都相當繁重的三十年代，編寫出我國第一部全面系統地論述商周青銅器的巨著《商周彝器通考》；在政治動蕩頻繁的年代編寫出一百多萬字的《叢帖目》和《歷代名畫著錄》（未刊）。

三

先生採用“土法”——抄讀法、校讀法及他自己的一書一評法，廣泛地閱讀與專業方向有關的書籍、論文，將茫茫知識海洋中有關古文字和古書畫的資料，滙集起來，按先生自己的話說，是屬於準備好各種肉菜材料，其間的校核、甄別、評價，就像是刮皮去毛，分離骨肉肥瘦，擇菜棄草，分別嫩芽老葉，做了去偽存真和去粗取精的原材料加工。而炒出各式各樣的菜色，則是屬於研究著述的功夫。雖然煎炒蒸煮等基本方法，大家相同，但不同風味的名廚有不同的套數。那麼先生在研究著述上有甚麼套數呢？這方面，不像“一書一評”常掛在先生口上，筆者很少聽說，只能憑直覺從先生的手稿和著作中，去探索體會先生的“炒菜妙訣”。由於筆者的能力和水平的限制，很可能體會錯誤，把握不準，在此斗膽嘗試，希望能得到先生的生前友好及先生的弟子們指教。下面就從材料處理、成說選擇和考證研究方面談談先生通常所遵循的方法和原則。

在材料處理上使用排比法。先生的重要著作，大概可分為字典、圖錄、通考三大類，各大類都有其獨特的成就。不管是編寫哪一類著作，先生都習慣於先收集豐富的文字、圖片或其他有關資料，經過精心的排比、篩選、分類，然後列提綱編寫。《金文

編》和《金文續編》，是先生字典類的代表作。四十多年來，有不少專家批評容先生保守，認為此書中有許多已可以認識的字，先生仍當作未認識而列於附錄；另有一些專家則認為，有的圖形文字入已認識的正編，又有一些圖形文字置於未認識的附錄，是屬於體例不嚴，等等。筆者曾經看過先生增訂第二版《金文編》時的四種不同的稿本，和兩種《金文續編》的稿本，並在先生指導下做了五年修訂《金文編》的工作，深感先生對單字形體的排列處置，是經過大量材料的反復比較推敲，是以文字學的基本理論為依據的，絕不是帶有隨意性的簡單排列。譬如很多批評者提到過的極象形的虎形、牛頭形置於附錄問題，那是因為它們在銅器上只起一個標幟作用。不能確定它讀“虎”還是“一隻老虎”、“虎族所有”；讀“牛”還是“牛頭”、“一隻牛頭”、“牛族所有”。而象形的魚形山形，卻又分別列在正編“魚”字和“山”字之下，那是因為在古文字中可以找到其字形發展的蹤迹，在銅器銘文中作為確定的單字來讀。大量的圖形標幟和象形單字，在第一次排比過程中同別的字區分開來以後，又根據原來的銘文中是否有確定的音義，有無其他的字形發展線索，作第二次排比，再將該入正編的字同附錄字區分出來。至於圖錄和通考類的著述，先生也是在掌握了極其豐富的銅器圖片、拓本，或法帖書畫版本以後，通過反復排列比較，多層次地區別同異，發現各自的基本特徵、重要特徵和次要特徵，才做出較為科學系統的標型學分類、定出實際可行的能辨別時代和鑒定真偽的標準來的。通過排比，在大量表面相同或相近的事物中，找出差異，發現矛盾，研究哪些是本質特徵，哪些是非本質特徵，找出規律，從而得出科學的定義和科學的分類，這是一種擺脫前人研究窠臼的實事求是的科學方法。採錄材料廣博，排比處理精密，分析考究信達，這是先生著述中最基本的特徵。

選擇成說的原則是，以具體事實為依據，博採通人，擇善而從。科學研究，需要對前人和時賢的研究成果，加以總結和揚棄。先生的態度是以是為是，非為非，絕不趨炎附勢因人定是非。按常理，後人所見的出土材料比前人多，可參考的資料和研究成果也多，後世名家的科研成就總在古人之上。但先生並不因此而簡單從事。例如，博雅好古的乾隆皇帝敕命梁詩正等一批名士，利用內府豐富的古物儲藏，摹仿宋代《博古圖錄》體例，編纂了《西清古鑒》、《寧壽鑒古》、後又命王杰等人修纂了《西清續鑒甲編》和《西清續鑒乙編》。從客觀條件而論，乾隆敕撰的《西清古鑒》等書應比宋徽宗敕撰的《博古圖錄》強，而且《西清古鑒》跋中也曾列舉《博古圖錄》考據失實者數條，自謂“兢兢乎不敢臆說以逞，以是為闕疑傳信”。然而先生並不輕信聲明，按常理遽定優劣，而是將《西清古鑒》同《博古圖錄》，在繪圖、銘文、考釋、鑒別、排比等方面作一番比較後，最後依據事實，得出《博古圖錄》在上述五方面優於《西清古鑒》的結論。又如《筠清館金文》的考釋為著名詩人龔自珍和經學家陳慶鏞所作，吳式芬、楊鐸、許瀚、吳雲燕四人曾指正其錯誤達總器數的一半以上。清末的考據名家孫詒讓的《古籀拾遺》，又校正了二十三器。先生對《古籀拾遺》是評價頗高的，譽為“矜慎不苟”，將清代的銘文“考證更往前推進了一步”。^⑤但就《古籀拾遺》對應公鼎的考釋而論，先生指出：“‘御公’二字當是‘鬻享’二字的泐文。全文當為‘奄肇作寶尊鼎，用夙

夕攬享’。末一‘各’字尙不可曉，不知何字之誤。可見吳氏固然錯誤，孫氏亦未必不錯，我尙留一字等待後人糾正。”^⑥又先生於一九二七年一月曾從梁啟超處借觀《筠清館金文》原稿本，梁氏跋云：“款識皆荷屋自摹者，矯健朴茂，得未曾有也”。先生則“以爲款識斷非吳氏自摹，觀款識旁所注小字可證。且所摹有工拙之異，非出自一手。惟書頭上朱書‘見《積古》’、‘見《積古》可刪’數字，審定係吳氏手筆。”^⑦先生就是這樣，認爲糾正他人錯誤的名家，即令是孫詒讓、梁啟超等也不一定全對，必須自己親自仔細地分析研究過，才能做出符合實際的結論。又如，郭沫若、唐蘭都是著名的古文字學家，考證古文字有很多創獲。先生對郭沫若聯繫典籍文義考證古字、對唐蘭在字形分析方面的聰敏，以及他們二人的辨才，都非常推崇。我們翻閱《金文編》，可見到引用了他們不少的創見。但在先生自存本《金文編》的附錄中，注滿了郭、唐的許多考釋意見，還有其他名家的批注。先生說：“這些字他們都已認識，但我還不認識。”因爲這些字，或是形體不能準確隸定，或是所釋字義在此處勉強可通而在另一處不可通，或是形體省變的解說尙缺證據，或是通假之說的條件不夠充分，等等。所以先生寧可讓人們譏爲“保守”，也要待將來出土材料豐富、研究更加深入，證據充分後再作定奪，並不因名家善辯便不細察而引用。另一方面，如果後輩學生有證據充分、言之成理的見解，先生並不因出自無名小輩而輕視，相反是十分重視地樂於引用的，好像第三版《金文編》中就引用年紀小很多的高景成先生的不少意見，在行將出版的第四版中，先生還引用了一些學生的見解。先生就是這樣，擇善而從的。

在古文字材料考證方面採用“雙重證據法”。一方面根據出土實物，對文字的形、音、義做出符合實際的分析，不用形體省變或通假來遷就假說；另一方面力求在古代文獻典籍中找出佐證。在古文字研究鼎盛的宋、清兩代，經學家們常沒弄清古文字的結構，即便附會爲典籍中的某人某事，旁徵博引，大加考證。先生在評述宋、清古金書籍時，常被這樣毫無根據的考證弄得哭笑不得，因此特別強調：“至於考釋，當以識字爲先。字不能識而遽加考證，正是毫釐千里。”^⑧因爲商周之時，漢字字數還少，^⑨漢字的偏旁還在形成過程中，許多通用字的含義和詞性不夠穩定。假借同音字的現象是非常普遍的。但是古文字學界常有一些人士，在處理暫時還無結論的文字材料時，喜歡從揣測文義出發，大膽假設，在形（包括全形和偏旁）、音（包括古音之聲、韻）未全弄清時，即單單據聲紐或韻部中的某一個條件，逕用雙聲、迭韻、旁轉、對轉的名義，旁徵博引經史，給材料做出結論。這樣濫用聲韻通假，將假設輕易地變成結論，先生是很不以為然的。一九七七年先生致周法高信中寫道：“弟於金文，只注意字形之聯繫，至於陰陽對轉之說，不輕於引用。如謂器乃狝之初文，狝從犬斤聲，古音同在文部；猥從犬畏聲，古音同在微部，猥狝兩字孰爲器之初文，則未可知。愚意器與狝猥有何關涉而牽連及之？”^⑩先生雖說“只注意字形之聯繫”，但並非反對使用聲韻通假，只是“不輕於引用”。先生的《金文編》中有不少字注明“假借爲某”、“讀爲某”、“其義如某”，可以證明：如果是在“注意字形之聯繫”的基礎上，把形音義當成統一體考證清礎。再詳徵博引典籍文獻，證明材料上的文字含義（包括假借義）可靠，雙重證據充分，先生

認為那是腳踏實地的功夫，是樂於採納的。

四

從上述關於先生的治學方法的分析中，我們可以感到有一種東西貫串於這些治學方法的始終，成為這些方法的靈魂。這東西，就是矜慎不苟的治學態度和百折不撓的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。

在先生看來，盲從，隨風轉，甚至不顧事實，信口雌黃，為取悅於某一勢力，以圖達到個人某種不可告人的目的，是科學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的奇恥大辱。那還是在十年前的批林批孔時期，某教授秉承“四人幫”旨意，著文大談商周奴隸社會的“仁”和“禮”時，先生收到報紙上的奇文，即找有關的甲骨材料和《四書》、《左傳》等書查對，原來甲骨上唯一的所謂“仁”字，不過是記有“二人”字樣的斷句殘文，所引孔子的言論也多是斷章摘句的。在“學習會”上，先生談讀後感時憤然說：“那是斷章取義！”並且聲明如果硬要強迫他違心地跟着斷章取義地參加批判，他寧可跳珠江！表現了一個嚴肅的科學工作者，忠貞不渝地信守實事求是科學精神的大無畏氣概。在“文革”動亂的年代裏，中山大學師生中還流傳着這樣的事：年逾古稀滿頭銀絲的先生，家裏只剩下他孤零零一人，白天在監督下割草掃地，晚上回到家裏，放下“牛牌”，捶捶腰腿，即在燈下撰寫他的《頌齋書畫小記》。他那百折不撓的治學精神，不僅廣大師生十分欽佩，就連被派去監督先生的年青學生，也深深為之感動。

世界上只有唯心主義最省力。但是，要實踐先生的治學方法，卻是要花很大氣力的，來不得半點虛假的。先生喜歡引用《禮記·中庸》中的一句話自勉和勉勵學生：“人一能之己百之，人十能之己千之，果能此道矣，雖愚必明，雖柔必強。”先生將五、六千件銅器中清晰的銘文拓本，剪出單字來排比、摹寫，編纂成《金文編》和《金文續編》；讀完上百部數百冊的古金書籍，數十部金石志和筆記地志，摘抄經典史籍中有關商周彝器的材料，將上千件的照片圖片反復排比研究，寫出三十多萬字的《商周彝器通考》；將數百種叢帖，數以千萬計的書畫，細心比對，用一千多年來的史籍和野史筆記中的有關材料加以考證說明，寫出幾百萬字的《叢帖目》和其它書畫考證著作；……。要掌握和駕馭這麼龐大衆多的資料，我們完全可以想像，若非“人一己百”的精神，是難以實現的。像《金文編》和《商周彝器通考》等著作，問世四、五十年，至今仍被治古文字和青銅器的學者奉為圭臬，若無矜慎不苟的嚴謹治學態度，也是無法達到如此高的成就的。

※

※

※

古文字，因它是考古出土，遠離現實，而帶有幾分玄妙的神秘感。容庚先生從一個中學畢業生，一躍成為我國最高學府的研究生，再躍而成為國內外知名的在古文字學、考古學和書畫叢帖考據方面有很高造詣的大學者，人們都把他看作自學成才的一個典範。如果著名學者本人的天資過人，過目成誦，有優越的求學條件，能順利走完從小學至研究生的每一階梯，他的治學方法雖有可供人參考之處，但人們常會覺得其特殊和高

不可攀，相比之下，求學青年對容先生的治學方法，顯然抱有更大的興趣。因此，在先生生前，每逢新學年開始，總有不少大學一年級新生、高考落選青年和其他社會青年，前往容家拜訪。他們既想一瞻景仰已久的自學成才名家的風範，更想探尋一套適合自己的能夠學到的治學方法。

說也湊巧，新學年開始的九月，正是先生降生的月份。先生對問學的青年，總是笑臉相迎，極其自然地講述治學的經過，從跟着四舅學《說文》，到一書一評、抄書、炒菜，用極其通俗的比喻，將自己的治學方法介紹給青年們，而且取出年青時的手稿讓青年們翻看。這樣，抽象的治學方法，一下子就成了有形象可觀看可觸摸的實體。原來這位遐邇聞名的學者常自稱生性愚鈍，其成功的秘訣竟是一點也不神秘的“土法”。這時會使人恍然覺悟到，難處只在自己能否持之以恆地實踐。起初帶着三分好奇、七分擔心，因而有些忐忑不安的心情進門來的青年，最後總是懷着十分滿足、十分崇敬的心情向先生道別的。

多少年來，先生都是這樣用追憶自己的治學經過，向青年介紹自己的治學方法，愉快而有意義地度過自己的生日的。今年的九月又快到來，我們再也不能聆聽到先生用和藹而通俗的話語，講述他的治學方法了。我作為受業二十多年的學生，謹以此篇小文，作為對先生誕辰九十周年的一點紀念，願先生留下的精神財富，更加發揚光大！

1984年於中山大學

注 釋：

- ① 1925年至1945年間出版的專著、圖錄、講義有：《金文編》第一版1925年，第二版1938年，《甲骨文》燕京大學講義1927年，《寶蘊樓彝器圖錄》1929年，《秦漢金文錄》1931年，《中國文字學形篇》燕京大學講義1931年，《殷契卜辭·附釋文及文編》1933年，《頌齋吉金圖錄》1933年，《武英殿彝器圖錄》1934年，《古石刻拾零》1934年，《海外吉金圖錄》1935年，《金文續編》1935年，《古鏡景》1935年，《善齋彝器圖錄》1936年，《二王墨影》1936年，《漢武梁祠畫像錄》1936年，《頌齋書畫錄》1936年，《伏廬書畫錄》1936年，《簡體字典》1936年，《頌齋吉金續錄》1938年，《西清彝器拾遺》1940年，《商周彝器通考》1941年。此外有三十篇論文散見於《國學季刊》、《國學周刊》、《燕京學報》、《國立北平圖書館月刊》、《文學年報》、《考古社刊》及當時的一些報紙。
- ② 日本·濱田耕作《泉屋清賞·總說》。
- ③ 容庚《海外吉金圖錄·序》。
- ④ 容庚《宋代吉金書籍述評》最初發表於1935年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編第一種《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·下冊》，1963年重修發表於《學術研究》（廣東）1963年第六期。《清代吉金書籍述評》見《學術研究》（廣東）1962年第二期和第三期。
- ⑤ 容庚《清代吉金書籍述評·上》，《學術研究》（廣東）1962年第二期48頁。
- ⑥ 容庚《清代吉金書籍述評·下》，《學術研究》（廣東）1962年第三期73頁。
- ⑦ 容庚《清代吉金書籍述評·下》，《學術研究》（廣東）1962年第三期70頁。

-
- ⑧ 從《甲骨文編》和《金文編》的正編和附錄看，一千多年的字數約五千左右，若分階段看商代或西周早期，除去大量專有名詞的專用字，通用字是少很多的。
- ⑨ 李孝定、周法高、張日升編著《金文詁林附錄》第2840頁。容信中所引內容參見《金文詁林》第三冊第1164～1166頁朱芳圃、張日升說。